

人世礼乐风景的缔造者：士与民

——小议胡兰成对中国文学作者的诠释

张 卓

(云南大学 中文系,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被王德威先生评为“有别于‘感时忧国’的文学正统”的胡兰成于五四之后形成了对于“中国文学的作者”独到的诠释。他将中国文学作者划分为士与民两类,并分别论述士与民的文学及文学精神。将士的文学精神概括为“礼乐文章的自觉”,把民的文学精神刻画为“好玩”与“喜反”。同时,胡兰成对士与民的文学之关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发现了民的文学与士的文学兴盛期交替出现,阐释了士与民的文学之间教化与被教化的关系。同时将士与民一同安放在中国千百年来深邃而现实的人世礼乐风景里,认为他们同是人世礼乐风景的缔造者。

关键词: 自然; 礼乐文章; 士; 民; 文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 I 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0X (2010) 01-0101-06

Founders of Ritual-Music Phenomena: The Intelligentsia and Civilian A Brief Analysis for Hu Lan-cheng'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Authors

ZHANG Zhuo

(College of Humanit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Hu Lan-cheng, the man whose articles was described as “different from the literary orthodoxy” by Mr Wang De-wei raised an unique interpretation about Chinese literary authors after May 4th Movement. In Hu's interpretation, he divided Chinese literary authors into intelligentsia and civilian, then elaborated th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spirit of these two kinds of authors; intelligentsia's literature was described as “consciousness for creating ritual-musical article”, civilian's literature was characterized as “prefer amusement” and “fond of rebel” vividly. At the same time, he posted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tsia and civilian.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he found the prosper stage of intelligentsia and civilian's literature was alternately, explained that the intelligentsia's literature influenced the civilian's literature deeply, and explained the relationship of educating and to be educated between them. Above all, he put either intelligentsia or civilian into the vision of rites and music, and considered both of them were the builder of the ritual-music landscape.

Key words: nature; ritual-musical article; intelligentsia; civilian; spirit of the literature

翻阅手边的文学史教科书,当读到论及文学作者的部分时,书中往往以其生存之时代背景、生平经历、代表作品、文学风格等为要旨而进行叙述,却少见有从作者的位份、气质入手,以文

收稿日期: 2009-10-18

修回日期: 2009-11-05

作者简介: 张卓(1988-),女,重庆人,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文艺理论研究。

学史的全貌为背景来阐释中国古代文学作者的笔触。然而,被王德威先生评为“有别于‘感时忧国’的文学正统”的胡兰成却于五四之后形成了对于中国文学作者独到的诠释,他将中国文学的作者划分为士与民两类,并分别论述士与民的文学及文学精神,细致而深刻地将士的“礼乐文章的自觉”以及民的“好玩”与“喜反”刻画出来,使人耳目一新。同时,将士与民的文学之关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笔势气脉实为文学史叙述之少有。

一、士与民之源

“中国文学的作者有两种,一种是士,一种是民。”^[1]在胡兰成看来,士与民的格局可以追溯到周王礼制的王官与王民。他说“士是王官,民是王民。后世制度虽改,此种身份的自觉还是一直承传着。”^[1]由此可知士与民的文学创作以及士与民的文学精神与这种“身份的自觉”关联紧密。

那么,士与民的这种“身份的自觉”源于怎样的“制度”呢?胡兰成又说“以前是王官省察民间的风谣,后来亦一直以礼乐文章教化民间风谣。”^[1]“士则在于民间,依于井田制的各单位,率民祭祀,发动耕作与收获,掌握学校教化,率民筑堤治水,率民军训与出征,率民做器车通有无,率民警护关防。”^[1]从他的论述看来,这种“制度”是来自井田制,在这种制度中,王官率领王民生产劳作,保卫家园,同时王官还要省察民间风谣,并从中总结出它反映出的民声民心,社会政治状况,然后再据礼乐文章教化和影响民间风谣,使其在契合天数的同时也契合王的统治。然而王官又不完全是处在统辖与控制王民的位置上的,在胡兰成看来,他们之间有着一种平等“王官与王民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是王官与王民共治。”^[1]我想这里所说的“共治”,并不是否认两者在地位上的差别,而应当是在说明王官与王民在心理上的一种平等,仿照他的一句话“王是王者之王,君是王者之君,民是王者之民,皆是王者”^[2]来说就是“王官是王者之官,民是王者之民,亦皆是王者一般”。王官有着据礼乐文章教化民的自觉与心理优势,然而民亦不示弱,同样以风谣的形式表达他们对天数王治的关怀与辨别,他们有言说心声的权利。

而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到位分的传承,使士与民都具有了自己的生存精神,这也正影响着士与民的文学与文学精神。

二、士的文学与士的文学精神

谈到士的文学,胡兰成说“如两汉文章,唐诗宋词,作者是士”,^[1]又说“士的文章体制,列于《文心雕龙》”^[1],由此可知士的文学类型可以从《文心雕龙》对于文体、文类的分类法得出。参考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其中大致将文类文类做了这样的分类:文类有辨骚、明诗、乐府、杂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文笔类有杂文、谐隐;笔类有史传、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这或可以作为士的文学类型。

在这种类庞杂而又缜密有序的士的文学中,包含着属于士这个阶层的文学精神,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可以说就是士的“礼乐文章的自觉”,胡兰成说“原来中国祭政一体的传统,文章属于天官太史,文章是士之事,作者有礼乐文章的自觉。”^[1]这是来自于曾作为王官的士对于自己位分的认识,他们有着一种自觉、一种责任。而胡兰成同时强调说“文章与礼乐生在一起,当然是建国的大业,但文章之士又当别论……文章之士也是专业,神官与牧师与文章之士都不足以治国。”^[1]可见对于士而言,礼乐与文章应当并重,不可仅仅以做文章为终极目的,因为如果仅仅是文章之士,则可能陷于艺人的范畴而“自己寻到艺术的幽谷去”^[1],因此,只有心怀礼乐而为文章者,方可以说是有着“礼乐文章的自觉”的士,这也正说明了“礼乐”对于士的重要性。纵览《中国文学史话》,胡兰成的言语之间也呈现着一种以“礼乐”诠释士的文学与文学精神的痕迹。

《礼记·乐记》有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3],可知礼乐是源于自然的,中国古人有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因此,在刻画礼乐精神的时候必是以大自然为经纬、为坐标而促其成型的。胡兰成说“如此更可以知道中国礼乐文章的可贵了。乐是通于自然的。”^[1]在作者看来,礼乐文章里包含着士对于大自然的感激与觉。同样,《乐记》中亦有“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声相应，故生变。变生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于戚旄谓之乐。”^[3]意在强调乐是出自人心对于自然万物之感。因此，作为有着“礼乐文章的自觉”的士在做文章时也必然离不开对于大自然的感悟，言语之间也必有大自然的声与息，正如胡兰成的那个恰当的比喻一样“中国诗境界犹如八大山人的一枝花，对之即是直接对了大自然，游于万物的生机”^[1]。同时，胡兰成说“文章的最高责任对象是天地神明……亦就是说要对应得大自然的五大基本法则，是这个缘故”^[1]，礼乐文章之士的地位是源于天官太史的，因此他们有着对于天地神明以及大自然的敬重与责任，故所言所书不但出于自然，而同时又是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激。《中国文学史话》开篇即提出“大自然的五大基本法则”，并以人世文明与之对应，这“法则”或可以说就是士作礼乐文章的准则：“大自然有意志与息。”^[1]因此士的文章有着这样“向上的自觉”，有着“统摄大时代的意志力”；大自然有着阴阳法则，就如人世的礼乐风景，如礼尚异而乐尚同，因此士的文章即以礼“别异”，使人们各归位分，不越名教之界，同时又以乐“合同”，用乐使人人相爱，户户和睦；大自然有“有限时空与无限时空统一”的法则，因此，士的文章里自有从有限的人世里开出无限风景的广阔气运；大自然有“循环法则”，故士的文章里则有轮回，则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感悟。

“周礼王制，惟王建国，与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是中国文学里朝廷之尊与官人的贵气的由来”。^[1]在胡兰成看来，曾是王官的士自然也是这“周礼王制”中的一部分，同样有着官人的贵气。“你不是士，即不在神前，即没有资格来写礼乐文章的文章”^[1]，可见，曾是祭政一体的王官的士是在神前的，“中国人是因于大自然以知神，又因于神以知大自然”，^[1]这个“神”不是来源于宗教的，而是来源于天，来源于大自然的，因此士的“礼乐文章”是在“代天立言”。所以他说“中国的读书人是士。士因为自己是贵人，所以他知道世上尊贵的人与尊贵的物”。^[1]自己是尊贵的，且知这世上尊贵的人与物，因此，士的文学精神里有着一种天赐的“贵气”。

然而，士又不仅仅是“天官太史”，他们同时也是生在现实里的，而对于人世国运有责。胡兰成认为，在井田制中，士是兼管祭与政的，而

且这种制度所包含的精神一直延续着，在这种精神的延续中，士在有意无意间就有了一种“礼乐文章的自觉”，这种“自觉”表现为对于家国天下，礼乐社会的关心。他说“士是先知先觉者，布衣疏食，而志在于天下”，^[1]既有这样高远的志，那么必有对社会政治的关怀与热情。“中国人亦是文章之美为最贵，但凡事自有本末，以视礼乐，则礼乐为本，文章为末，所以李白、苏轼皆不愿只做个文章之士，欧阳修对客多谈政治，很少及于文章”。^[1]前面也说到，文章与礼乐生在一起才是建国大业，士的文章里也要有礼乐才足以治国。所以士的文章里应当有对于人世的关怀、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注。胡兰成说杜甫的诗文里“多事”，便是意在言明他对于人世里一切关乎家国天下，民声民怨之事的关心，这“事”便也就是杜甫心里的忧国忧民。

胡兰成常提到五常，而士作为“王官”必然也要遵循“君臣有义”的准则，君主“王天下”，士作为臣子在其身边进行辅佐，在辅佐君王的过程中，士的文学里就有着一种“忠君”的精神。然而在胡兰成这里“忠君”又有了不同的诠释，他说“皇上若要一意孤行，就有言官要谏。御史对君不是有权，而是有爱情，若不知中国人的爱君之情，有如基督徒爱基督与佛弟子的感激自尊，即无以知御史对着皇上谏诤的恳切深至。”^[1]他又认为这是一种“知性化的情（情惟到了无限，才是情的知性化）”，这种知性化的情就像“基督徒惟有是对于神与基督……而中国人则是对于君的义而来。”^[1]由此看来，胡兰成认为士的出于“忠君”的“怨刺上政”，不是出于权利的驱使与权欲的满足，而是出自对君王的爱，而且是爱到无限的境地，以这种热情来劝谏君主，使其在符合天命的准则中构建“王天下的风景”。这或可以用屈原的劝谏楚王而遭疑弃，投汨罗前的《离骚》为例。

士对于人世的热情铺撒在礼乐社会里，表现着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的关心、对于君王的尽忠，当然也不能缺少对于民的责任。这种责任里包含着为民谋福祉与教化民的两个方面。在胡兰成看来，在士有着“礼乐文章的自觉”的时代，若中华大地上有革命起，则往往是士领导民完成的，这正是出于士为民谋福的责任心理。其次，士还担负着教化民的责任。这整个过程或许可以这样

理解：人世由三方构成，即王、士与民。王与民在两头，士在中间。王想以风化民，必要通过士以礼乐文章感化民，而民有怨，则必要通过士的手笔以谏言的方式达到“怨刺上政”的目的或是以革命的方式达到为民找回福祉的目的。这样一来，士就有了作为王与民纽带的“中坚”心理，这种心理正衍化成为士对于人世清明的责任。

在胡兰成看来，这也正是中国的士的特别之处。他们不似西方文学作者的小市民情节，不会仅仅“以为义务与权利就是道德”，不会把“科学的常识与事务的常例”与这种来自于义务与权利的“道德”相加作为一切的标准，而是以天道自然为己任，以家国天下为职责；同时，他们也不会像日本的艺人，仅仅醉心于艺术本身，而是就此“豁脱”于艺术之上，正如胡兰成所说“如果是天下士，当然礼乐文章便在于一切”^[1]，他们能使文章超越于艺术之上，而近乎天然，境界宽阔。

三、民的文学与民的文学精神

再来看看民的文学。胡兰成说“民的文学种类有民谣、童谣、民歌（民歌分竹枝词、子夜歌、襄阳乐等），唐以前得多收在《古乐府》集里。及平话说书……平话与说书经过文人编修的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虽经过文人修改，亦还是民的文学，不属于士的文学。民的文学还有元曲与明清以来的地方戏与平剧。”^[1]其中特别强调了经过文人编修的来自于平话与说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可见小说这一文体是士与民皆有，而不是哪一个阶层独占，并且它还往往是由民而生，靠士来进行再创作与再加工，但归根结底功劳却仍归于民，因为民才是这以“渔樵闲话”来讲述大历史的首创。

在胡兰成看来民的文学精神最核心的恐怕要数“好玩”与“喜反”。他在谈到“好玩”时说“先来知道民的文学性格……观众明明知道自己在看戏，演员与观众都像小孩的认真地游戏，在艺术之外有人的跌宕自喜”^[1]在他看来，这种游戏的心理正是源于劳动之中对于美与愉悦的追求，他说“世界上就是中国民族最会玩，佳节灯市是大人的摆家家酒，采菱采莲采桑捣衣浣纱的风景，是把劳动亦当做好玩。”^[1]而这也正与康德和席勒

所提出的“文学起源于游戏”之说相合。但这复杂的理论由胡兰成的笔下生出则真正有一种“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清明亮丽与愉悦。民的文学可以把辛苦的劳作亦当作是玩，因此便可以把人世的一切都当做是在玩。胡兰成看《西游记》，说里面讲师徒四人来到雷音寺取经，阿傩向他们索取贿赂，就是作者玩笑之心的表现，在严肃的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不敬，然而就是这样的玩笑之心，表现了民的文学里那种与神、与天玩在一道，与大自然融在一起的快乐。

而胡兰成说“最大的好玩亦是革命，革命是中华民族之跌宕自喜。”^[1]这就是从民的文学中“好玩”的心理生发出来的另一种精一“喜反”。胡兰成说“‘反’是创造……这个反，不一定与斗争相关。”^[1]又说“中国人是对神亦敢反，因为大自然的始动就是反。”^[1]因此就有了孙行者对于观世音菩萨也敢在背后说一句坏话；才有了白蛇娘娘的水漫金山，敢率领虾兵蟹将去和法海的天兵天将打仗。而这里的“喜反”亦和“好玩”一起，支撑着民的文学，两者疏离聚合，让民的文学显出一种可爱与轩豁。

但胡兰成又说“民的文学虽喜反乱，而皆主于忠孝义节，天下有一个正统。”^[1]因此，民的文学里亦有忠义的精神。胡兰成还将它归结为一种“亲亲之怨”，他说“亲亲之怨最使人感动的是《离骚》与《白蛇传》，屈原与楚怀王，与白蛇娘娘对许仙，都是忠而不见知。而古来家庭里、与男女情人的、朋友之间的亲亲之怨皆可通于忠君。”^[1]从胡兰成对于民的文学的分类来看，《白蛇传》应是属于民的文学，其中包含的正是白蛇对于丈夫许仙的忠义。而依胡氏的观点，民的文学里的忠孝义节，或可归于他常提及的“君臣有义、父子有恩、兄弟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的五常：君臣有义则臣子应当据理直谏、父子有恩则子女应当孝亲反哺、兄弟有序则弟当悌及兄长、夫妇有别则夫妇当互敬互爱、朋友有信则应诚恳而不相负。而这一点却又回归到了胡兰成所说的“礼能铺排万物”^[2]中来，回归到了士以礼乐文章教化民间风谣中来，民的文学里仍隐藏着士的文学的影子。

再者，就要说到民的文学对于天数政治的敏感。胡兰成说“在文学上，士与民皆对政治天数敏感，于事理明白，男女爱悦有空与色之际的新

艳。有时民比士敏感，因为士或被其学问与身在政治当局，蔽其知性。”^[1]又说“民的文学里，对于政局敏感的先表现在民谣……而还有童谣则是对天数的预感”^[1]。之后又举出汉时的风谣“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缝，兄弟二人不相容”并认为这正是民的文学对汉景帝杀淮南王一事的谴责。之后又举出《三国演义》里预言董卓被杀的童谣说明童谣对于天数的敏感。这可归结于民文学里的“喜反”，但作者似乎仍抱着“好玩”的心理像是“荧惑星下凡的绯衣小儿”一样高兴天下大乱。然而，又不完全是这样。民的文学有着一种旁观者的清醒，他们往往用最现实、最人世的观念去观望政事，用天启的智慧去探访人间的治乱离合，这或许是士作为局内人所没有的眼光。

四、士的文学与民的文学之关系

士的礼乐文章的自觉、民的好玩与喜反、士对于天道人世的责任心与民对于政治天数的敏感，都是胡兰成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作者所具有的文学精神的独到见解。同时，他还注意到了民的文学与士的文学的兴盛期交替出现的现象。他说“中国历史上几次都是士的文像日蚀的隐晦无力，民的文学就像满天繁星的璀璨起来。”^[1]并列了这样一些时代作为说明，他说：“晋时朝士虽然清谈误国，民间却还是很活泼的，这从彼时民间歌谣之盛可以看得出来。”^[1]；“自宋末至元明清是士的文学固陋已极，但民的文学依然好精神。”^[1]从他的观点来看，民的文学优于士的文学大约发生在晋时与宋末到元明清。这两个时代，一个是士自身的清谈误国，为自身在乱世得以保全而不愿也不能履行礼乐文章之士对于天道人世的责任心；另一个则是“自宋儒不知游戏，士的文学遂不如民的文学”^[1]，以及“明清士专于儒，儒专于科举八股，亦有为朱王理学，或训诂之学，他们皆不屑自然界的知识，亦不知天下形势，亦不会文学。”^[1]究其原因，胡兰成说“文学至程朱而坏，文学坏即是先王的诗教坏，即是礼乐之乐坏了。但此亦只是结果而非原因。原因是残唐五代至宋，没有像五胡乱华至隋唐那样出现的大创造力，出的人才亦不够，若有像北魏至隋唐那样强大活泼的士风，虽有程朱，亦是像王通（文

中子）的不被人注意（文中子的语句全仿论语，但是这点就已使人厌鄙他）”^[1]据此，可知士的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于晋时自主放弃，于宋末至元明清而远离了士原有的文学精神，而出现了士的文学不及民的文学有好精神。这是由于士减轻了礼乐文章的自觉，放弃了对于天道人世的关注，远离了对于大自然的感激与觉，忘却了游戏的乐趣，因此士的文学就失去了可与民的文学比肩的锋芒。

然而，这对于两者的关系来说还并不完全，因为士的文学与民的文学并不是分离的。胡兰成说“原来中国祭政一体的传统，文章属于天官太史，文章是士之事，作者有着礼乐文章的自觉，以前是王官省察民间风谣，后来亦一直是士以礼乐文章教化民间风谣。是对文章的这种强烈的自觉，贯穿于昭明文选，至欧阳修、苏轼皆然，而被其教化的中国民间风谣，连茶店说书与戏曲在内，亦为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民谣与戏剧所不及。”^[1]可见，士与民的文学有着教化与被教化的关系，民的文学里也有受士教化的痕迹，胡兰成说“王官与王民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是王官与王民共治，所以世界上唯独中国之民自古以来一直亲近政治”^[1]，因此，民的文学里就多讲时事政局并常常表达着对于英雄豪杰的热情。

士与民共同生活在中国千百年来深邃而现实的人世礼乐风景里，同是人世礼乐风景的缔造者，他们被这礼乐风景塑造着成长着，而又反过来缔造着这人世的礼乐风景。在长远的文学史历程中，他们一直是息息相关，缠绕绵连的。胡兰成说“中国是士的文学也非常接近于民的文学，民的文学也非常接近于士的文学。士的文学有采桑、采莲、采菱、捣衣之诗，是写民之生活风景，民的文学如民谣童谣平话则多讲政治时局英雄豪杰之事。”^[1]由此可知士的文学与民的文学不是各成一体式的发展，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时他举例说“元曲是民的文学，而由士协力所成。当时是异族入主中国，士心存自觉，志气未堕，故其协力民的文学，能有如此亮烈的元曲，而亦是中国的民的文学与士的文学本来有着一种接近，才有两者这样协力的无间然”^[1]。

由此，可以推知在胡兰成的观点里，士与民

的文学是并行发展，互相助力的。两者的互相接近应当来自于士与民的文学中相同相近的文学精神。综观全篇，士与民的文学精神里头相似之处是不少的：士的文学里有忠君，而民的文学里则并不缺少忠义的元素；士的文学里有着对大自然的感悟，民的文学里也不乏对于天道的预感；士的文学里有礼乐文章的自觉，民的文学里也有对于政局的敏感。民的文学里有好玩与喜反，士的文学则不乏游戏的心理与为民协力的同反的心理；民的文学里有一种对于人世现实的亲，士的文学也并未远离现实人间，而是关注民声民心并有“怨刺上政”之诗文与谏言。

胡兰成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作者的观点只是其有别于正统观念的理论之冰山一角。黄锦树先生说“胡兰成的‘理论’根基至少包括了《易经》生克之道，禅宗的感悟说，《诗经》温柔敦厚的美学，以及日本女性中心美学”。对于胡兰成来说，这样丰厚的底蕴营造出甜腻精致的《今生今世》、清嘉婉媚的《山河岁月》、渔樵闲话式的《中国文学史话》以及深奥却富有情意的《禅是一枝花》都可以说是他厚积薄发的结果。陈国球说“胡兰成论文学特别之处不在结论，而在于解释说明的方法，以及由这些解说过程衍生的种种遐想。例如汉唐盛世如何从乱世中开出的解释，又如士与民的文学之渊源的追溯，以至以‘礼乐

文章’为基点去理解中国文学特色等，均是心裁别出。”的确，胡兰成的文章在诠释问题的方法上是十分独到的，照他的意思，或许就是一种心怀天意，而不是按古板的逻辑分析来叙述思想的过程，他的作品并不是单纯的学术性著作，不会用严密的分点细谈的方式来叙述，也不会用居高临下的口吻来教训。读他的文章，若不细细思量，则往往会如坠云雾，但若是慢慢品鉴，那么从一句简短的话里便能尝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里的余味无穷。

[参考文献]

- [1] 胡兰成. 中国文学史话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 [2] 胡兰成. 山河岁月 [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
- [3] 杨天宇. 礼记译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4] 胡兰成. 今生今世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5] 刘勰 著. 范文澜 注. 文心雕龙注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6] 李泽厚, 刘纲纪. 中国美学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 [7] 陈国球. 褻褻于文学的风景中——看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 [J]. 香港文学世纪, 2005, (2): 56-62.